

宋代景德镇陶瓷窑业状况

——蒋祈《陶记》研究



江西美术出版社
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

SONGDAI JINGDEZHEN TAOCI YAOYE ZHUANGKUANG
JIANGQI TAQIYANJIU

余勇 邓和清 著



76.1/4-4/2
2013/

阅 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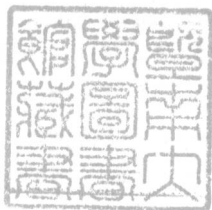
宋代景德镇陶瓷 窑业状况

——蒋祈《陶记》研究

songdai jingdezhen taoci yaoye zhuangkuang

JIANGQITAOJIYANJIU

余勇 邓和清◎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宋代景德镇陶瓷窑业状况 : 蒋祈《陶记》研究 /
余勇, 邓和清著. — 南昌 :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480-1446-1

I. ①宋… II. ①余… ②邓… III. ①陶瓷工业—
手工业史—景德镇市—宋代②《陶记》—研究 IV.
①TQ17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8069号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
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责任编辑: 危佩丽

书籍设计: 汪宜康+先锋设计

宋代景德镇陶瓷窑业状况 ——蒋祈《陶记》研究

出 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邮 编: 330025

网 址: www.jxfinearts.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4.5

字 数: 116千

ISBN 978-7-5480-1446-1

定 价: 26.00元

赣版权登字-06-2012-511

《陶记》无疑是目前所见中国第一部记载有关景德镇陶瓷窑业状况的论著，其价值早已为中外业界学人所重视。而关于景德镇陶瓷制作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自明代以来逐渐出现，如明嘉靖《江西大志·陶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陶埏》等，至清代的朱琰《陶说》、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则臻于大备。

余勇、邓和清两位学人重新从《陶记》释读开始，仔细分析文中的含义，在全面掌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宋代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研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确认《陶记》是南宋著作，尤其在窑炉与税制方面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观点，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并且还对其中的赋税作了深入的探讨，资料翔实，论述有力。他们之所以取得这方面的成绩，主要在于他们不但有比较深入的和广阔的思路，而且能够专研文献资料。这些见解无一不是建立在他们对《陶记》进行逐字逐句的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得来的，不作空谈，推论合理有据，应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从事学术研究，光堆积材料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新的思维方法，掌握新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在研

究领域有所新见。

我觉得研究《陶记》，应该先得对它有一个较为合理的释读，两位的这部专题研究著作，就是从这点开始的。还有，他们在研究的方法思路上有新的变化，这显然与研究的视野拓宽有关，即把《陶记》的内容放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华夷观念等大的社会背景下考察，而不在一些细枝末节、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纠缠不清。现在，大量的研究新成果、新材料的文章不断涌现，这有益于对该课题的研究作出新的认识，加上他们的刻苦努力，又有陶瓷艺术创作设计方面的实践，所以，其研究是值得期待的。

总之，这部《陶记》研究著作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对本课题的研究是有益的。两位作者邀请我为他们的著作写几句话，本人欣然接受，我相信，将来读过此书的陶瓷界人士，定会感到它是一本有己见的书，不是人云亦云。是为序。

景德镇陶瓷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2012年5月4日于陶院

导论/1

第一章 景德镇窑、定窑、龙泉窑共竞奇矣/6

第一节 关于景德镇窑/7

第二节 “真定”何意？/14

第三节 “龙泉青秘”存在否？/17

第二章 景德镇窑之纲纪/21

第一节 征收窑户税是按容量还是按瓷数？/23

第二节 窑炉改革与税制有关吗？/29

第三节 满窑、报火、拣窑、店簿和非子/35

第三章 产品内销及其品种/40

第一节 浙之东西尚黄黑瓷的社会背景/42

第二节 景德镇瓷器内销地区/46

第三节 元代“肃政廉访司”只是行政机构名， 不是行政建置名/53

第四节 陶瓷装饰、造型及其名称术语释义/57

第四章 景德镇瓷窑生产状况/62

- 第一节 霜冻天做陶要诀/63
- 第二节 一元配方和二元配方论辩/65
- 第三节 传统灰釉工艺/82
- 第四节 陶瓷生产各司其职/84
- 第五节 “窑有尺籍，私之者刑”是限定窑炉还是谁来登记烧量入籍的问题？/88

第五章 景德镇所承担的赋税情况及《陶记》著于时代/98

- 第一节 这些赋税可元可宋——没有时代烙印吗？/99
- 第二节 关于“州”和“州家”/106
- 第三节 关于瓷器市场竞争的问题/111
- 第四节 《容斋随笔》与《陶记》的写作年代关系/115
- 第五节 关于《陶记》写作年代推论的讨论/119

第六章 今日董陶能“复古”吗？/129

后记/134

导论

关于陶瓷生产及其工艺方面的专著，明以前历来少见，即便有，留下的也只是一些零星记载，要么就是因吟赋而载一二名而已。《陶记》可谓是一篇记述景德镇陶瓷生产状况最早的专文，虽然字数不过1085个，但内容相当丰富，在陶瓷史上意义重大，广为中外业界人士所关注。

蒋祈生平不详，其《陶记》著作年代，目前见之最早的是藏于景德镇图书馆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刊印的《浮梁县志》里——其标题为：“蒋祈陶记附”（图一），当时，编撰该县志的人并未对它所

作的时代进行断定。相隔60年之后，也就是在乾隆七年（1742），《浮梁县志》再收录此文时，其标题则为：“元蒋祈陶记略云”。

显然，乾隆本对康熙本附录的《陶记》作了认真的释读，除填补了空缺4字，还给它断定为元代；而“略云”则表明它并非完整本，而是缩略



图一 蒋祈陶记附

本。

关于《陶记》的研究，自乾隆年县志断定为“元”以来，历来学者大多沿用此说。1981年《景德镇陶瓷》出版《陶记研究专刊》，刘新园撰文《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以下简称《考辨》），认为它应著于南宋的1214年至1234年这20年内，引起国内学人的震惊。

然而在1983年，《景德镇陶瓷》第3期发表了熊寥反驳文章《蒋祈〈陶记〉著于元代辨》，认为它不是写于南宋，而是著述于1322年至1325年这3年间。又于1990年的《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发表《再论〈陶记〉著于元代》，并且对它进行详细的译注；2008年他在《中国古陶瓷研究中若干“悬案”的新证》（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一书中，把他近20年来研究《陶记》的文章汇集在一起，以第六章《〈陶记〉断代研究》为专题结集发表。可知其为此课题所付出的心力。

现在我们简略比较他们的研究状况：

首先，《考辨》以制瓷原料上来作考量——“一元配方”、“二元配方”，通过比对现今古陶瓷的科学测试微量元素数据，即宋代的瓷胎中的 Al_2O_3 （氧化铝）的含量一般在17%左右，元代和元以后一般都在20%左右或以上来作判断区分。《〈陶记〉断代研究》则认为：据专家测试的结果，宋代有些瓷胎中也有接近20%的 Al_2O_3 的例子，元代的瓷胎中 Al_2O_3 含量也有接近18%的例子，故以此标准来判断不能成立（115页）。尽管宋代与元代初期所使用的原料多少已有点不同，但是这种区别还不是非常明显，孰是孰非，争论很大（就此问题后文将专门讨论）。

其次，从装烧工艺和装饰特征来作分析断代，《考辨》据蒋文中的“或覆、仰烧焉”及提到装饰手法有“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由此认为当时“覆烧”、“仰烧”并存，但从其行文来看，“覆烧”、“印花”在前，表明这种装烧工艺在当时应用最广，那么通过研究这个工艺就可以得出其著作时代来。《〈陶记〉断代研究》

则认为：这其实并不存在主次之分，它们属于并列关系，故这思路也不能成立（117页）。

第三，关于镇瓷内销，蒋文的记载是：“浙之东西器尚黄黑”、“江、湖、川、广器尚青白”、“碗之类……川、广、荆、湘之所利”、“盘……江、浙、福建之所利”、“两淮所宜，大率皆江、广、闽、浙澄泽之余”。《考辨》认为：从范围上看，这些地区，不越江淮以北，显然是绍兴议和以后的南宋王朝的半壁山河。《〈陶记〉断代研究》认为：“这个立论表面看来，似乎有力，但细加分析，却纯系臆断（122页）。”双方各持一词，相争不下。

第四，瓷窑市场竞争问题。《考辨》认为：《陶记》所说，定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同在北宋时代竞相斗艳的史实，可以得到考古资料证实。《〈陶记〉断代研究》则对其研究一一否定。

第五，《陶记》所描述的瓷窑税制是：“兴烧之际，按籍纳金”来收缴窑户税额。《考辨》以《元典章·户部八》所记载的窑税是按“烧到窑货”来计算，与之对比，两者不同，认为前者是南宋的“苛酷的税制”，后者为薄赋。《〈陶记〉断代研究》认为：“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他也据《元典章》得出，在至元五年（1268）——此时蒙古国未统一中国，“烧到窑货”三十分取一的税率，后来改“二八抽分办课”，其税率高达25%，认为元代的窑税这么高，怎么能说成薄赋呢，他觉得令人费解（109页）！

第六，由于每个时代在税目与官职的设置方面都不尽相同，因此，《考辨》认为：赋税名与官职名，以及考证景德镇在当时每月所需完成国家下达的各类赋税的总额数，就有可能帮助我们典章制度的角度一睹其著作年代的背景。《〈陶记〉断代研究》认为，这些税目和官职可宋、可元，得出“统制之供给”、“经总之移用”，只能说明元代在一个特定时期沿袭宋的“诸名征赋”罢了，不能作为《陶记》写于南宋的根据（107页）。

上述研究，可以说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该课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由于当时的学术环境有限，更由于对蒋文中一些句子的理解问题，其间尚有许多关键问题仍未得到深入的展开与系统、详尽的分析。

为此，我们认为，通过逐字逐句译读并结合相关文献史料以及考古材料，结合宋代社会文化、思想背景，在借鉴和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新材料，从《陶记》中涉及的行政建制、职官、税制，以及对“州”与“州家”乃至其背后的文化、思想背景来考据，还是能够反映出文本的时代烙印来。所以说，读懂《陶记》并作较为正确的释义，尤为重要。

因此本书的各章节是据《陶记》文本内容依次来安排的。第一章主要探讨景德镇置镇的理由和时间以及其瓷器似玉的特色。第二章分析蒋祈文中有关镇窑的一些纲纪，并对这些纲纪内容所显示的时代背景作考察。第三章进行宋瓷销售的范围分析。第四章阐述镇窑工艺原料及其制作程序的情况。第五章从当地赋税、“州”与“州家”以及《容斋随笔》来看《陶记》著作时代。最后一章进行“复古”的内涵与宋代社会背景研究。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阐释文本与讨论相结合，依据文献考古资料，并在释义、论证的同时，我们会针对熊寥《〈陶记〉断代研究》中的研究、注释以及翻译中的一些值得斟酌的问题，提出来评论，目的都是为了对《陶记》真相进行重新思考，以期望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有所发展，还原它的本来面貌，尽量避免随心所欲，穿凿附会。我们研究中的不妥之处，还望得到大方之家的指正。凡在下面的讨论中涉及熊文观点的引文只直接在文后标出页码。我们“将它分为上篇和下篇来释读：从‘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到‘其周防可谓密矣’为上篇……下篇主要是作者对‘今’之社会状况及官员腐败和瓷业的衰退发表感慨”。这主要区别“今”“昔”之变化（邓和清：《我读蒋祈〈陶记〉》，台湾《陶艺》杂志，2010年，第68集，114页）。

第一章

景德鎮密、
定密、
龍泉密
共競奇矣

第一节 关于景德镇窑

当今，陶瓷业界的学人们通常以“多种瓷窑体系”的形成来概括宋代窑业发展的现象或者亦以“类型”来划分的。其主要依据，当然是诸窑厂的工艺、器形、釉色以及装饰风格的异同来认定，所以一般认为在宋代有七大窑系：北方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以及磁州窑系；南方主要有龙泉窑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建窑的黑釉瓷系。举例来说，“磁州窑系”陶瓷是指北宋以来主要在北方地区生产的一类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工艺特点、造型的陶瓷。这个窑系的窑厂分布在河南、山西、河北磁县、峰峰矿区彭城等地，都曾是这类瓷器的重要产地，因窑厂在古磁州，所以称为“磁州窑”。而那些与它生产相似产品的一些窑厂就被今天的学人划为“磁州窑系”，因此具体说来，景德镇青白瓷系应包括安徽的繁昌窑、南丰窑在里面，那么它们就属于“景德镇窑系”。

《陶记》开门见山就谈到当时景德镇陶瓷业的兴盛场景：

“景德陶（读yáo，通窑），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它所，皆有“饶玉”之称。其视真定红磁、龙泉青秘，相竞奇矣。”

景德镇位于昌江河流的南面，故在唐代以前称“昌南镇”。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说：“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大抵坚重朴茂，

范土合渥，有古先遗制。”“唐代五德四年，有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献于朝廷，于是诏仲初等暨玉制器进御。”可见景德镇产陶始于汉代，到唐初生产的瓷器就被称为“假玉器”。那么，关于景德镇建镇年代及其成因又是什么呢？

毋庸置疑，景德来自宋代第三位皇帝真宗（赵恒）的年号——景德元年（1004）至景德四年（1007），这4年间。

关于景德镇置镇年代，我们一般还是据清人徐松依宋“会要所”保存的材料编辑而成的《宋会要辑稿》第19卷方域十二所载：“江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置”，即1004年。2004年景德镇隆重庆祝建镇千年，市政府就是以这一时间为准。

但是明代嘉靖年王宗沐的《江西大志》卷七《陶书》却说：“陶厂景德镇在今浮梁县西兴乡，水土宜陶，宋景德中，始置镇，因名。”之后的一些文献比如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浮梁县志》、陶瓷著作《陶说》及《景德镇陶录》皆沿用“宋景德中置镇”。只不过《陶录》说“至宋景德年，始置镇”。均没有明确的年代。

《宋会要》可能把“江南东路”误写成“江东路”，因为在真宗时分全国为18路，神宗时分为23路，徽宗崇宁四年（1105）又增1路为24路，均无江东路。关于“江南东路”，《元丰九域志》卷六是这样记载的：“江南路，太平兴国元年（976）分东、西路，后并一路。天禧二年（1018）复分（东、西）二路。”《宋史·真宗纪》则为“天禧四年（1020）”。由此可以看出，976年分江南东、西两路，“后并一路”则就是江南路。1020年又分成两路。这样的话，景德年间（1004—1007）饶州景德镇当属于“江南路”才是。尽管把“江南路”写成“江东路”可能为抄写所误，但毕竟“宋会要”为原始材料编撰而成，故当以此说的“景德元年”为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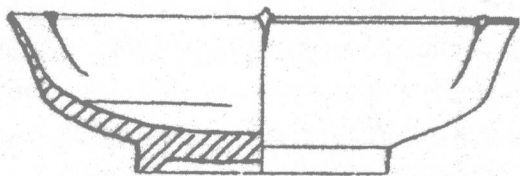
那么是什么理由促成景德镇置镇的呢？

显然，“景德”一词来自宋真宗皇帝的年号。然而有学者推测说：景德镇建镇伊始可能并不称为“景德镇”，而应另有名。原因很简单，景德年间（1004—1007），不可能只建一镇，要是都以当时年号来命名，那可能就有很多景德镇了。然后他又肯定景德镇是在景德年间建镇，很可能是后人才这样来称呼的。当初置镇原名为“昌南镇”（李广宁等：《景德镇瓷窑业兴起的时间及其成因初探》，载《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0辑，2004年，紫禁城出版社）。

当然这仅是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猜测而已。如按他这个逻辑，中国历史上以帝王年号命名的地名，都是以后追加的，这的确有点穿凿附会之嫌。中国历史上早在东汉建安八年（197）就有以建安命名的建安县（今福建建瓯）。这种当时命名的现象，在《洛阳伽蓝记》中就有明确记载：百官等建立一所寺院，恰是在北魏宣武帝（元恪）正始年间（504—507），因以为名，故称“正始寺”。宋代也有这样的例子，即在景德年间建立的寺院就叫“景德寺”。所以这样的情况一点都不稀奇。据华林甫的《中国地名学史考论》：“年号地名的实例，唐代有14例，宋代有17例，元代连一例也没有，明清时期反而要避年号的讳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列举。问题倒是景德镇置镇是因为居住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呢？还是首先因为生产瓷器，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利润呢？

有学人认为：景德镇在北宋真宗景德年间置镇，不能表明景德镇制瓷业在当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是在景德年间置镇，更多地昭示了当时该地的居住人口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而非因瓷器。他说，在1078年至1085年置务，才显示景德镇瓷业的繁荣（肖发标等：《试论宋代景德镇建镇的年代》，载《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0辑，2004年，紫禁城出版社）。这个观点值得讨论。

诚如他所言：乾隆年间的《浮梁县志》所载的“宋真宗遣官制瓷贡于京……命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底，天下于是咸知……”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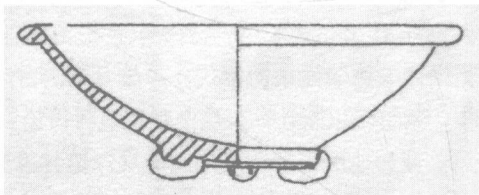
图二 C型I式青白釉瓷盘

出自清代康、雍年间的吴极所撰的《昌江历记》，此书更多是被当作一种传说看待，而不是把它当作严肃的可靠的历史资料。

但是考古表明，景德镇在唐五代时期，就有生产瓷器的窑址，如黄泥头、胜梅亭、石虎湾等遗址，产品大多是白瓷和青瓷。有人判断白瓷仿效北方白瓷，青瓷仿效越窑的青瓷。到宋则演化成极具景德镇特色的影青瓷器。

2006年，江西考古研究所对景德镇市昌江区竟成铜锣山窑址进行了挖掘，第一期的堆积层出土的器物均为青白釉瓷器，多数具有北宋早期的时代特征，比如C型I式青白釉瓷盘（图二），与内蒙古辽代开泰七年（1018）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青白釉瓷划花缠枝菊纹花口盘的造型相同；青白釉瓷花浇，与江西彭泽县北宋景德四年（1007）墓出土的青白釉瓷水浇的造型相同；还有A型I式青白釉瓷盏（图三），与山西平定县建于北宋至道元年（995）的佛塔地宫出土的白瓷盏造型相同。所以得出结论，其上限最早可至五代晚期，第一期的年代大致为北宋早期，即北宋建隆元年至乾兴元年（960—1022）（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镇竟成铜锣山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5期）。

再者在北宋初年，太宗淳化元年（990）以前，国家库藏中设有“瓷器库”，《宋会要



图三 A型I式盏